

## 英国战争文学中的幽灵书写

刘胡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州 510000)

---

Ghost Writing in British War Literature

Liu Humin

(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0, China )

---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社科项目中的研究成果之一,“英国战争文学中的幽灵书写”,这个研究成果是我跟一个研究生杨康合作的,目前刚刚写完,可能还不是很成熟。今天我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英国战争文学中的幽灵书写。

我的发言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点我会简单介绍“幽灵批评和英国战争文学的发展”。第二点我会谈谈“传统战争文本中的幽灵:伦理说教的工具”,在中世纪的传统战争文学文本中,幽灵主要被当作伦理说教的工具。第三点我将会谈到“现代战争文本中的幽灵:创伤的症状”,比如在20世纪的战争小说文本中,幽灵是战争创伤的体现。第四点我将涉及“新世纪战争文本中的幽灵:历史的再现和创伤的治愈”。

“幽灵批评”的英文是“spectral criticism”,也被称为“侵扰”(hauntology)。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其理论源头主要包括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本雅明的废墟美学,其关注的不仅是文本中玄学意义上的幽灵、鬼魂以及其他超自然的现象,还有文本中和文本之外一切“介于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间质性存在”。换言之,一切同时拥有在场和不在场特质的人或事都可被看作幽灵,都可被纳入幽灵

---

作者简介:刘胡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现当代小说、创伤文学、战争文学和希腊罗马神话研究。

批评的范畴中，例如非法移民、流亡者、奴仆等边缘人是社会层面上的幽灵。另外一个不在场就是讲文本之间的侵扰。

英国战争文学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传统战争文本、现代战争文本以及新世纪战争文本。不同时期的战争文本呈现出不同的战争观。传统战争文本主要包括中古时期的叙事长诗、传奇、骑士文学、莎士比亚历史剧以及“一战”早期的爱国主义诗歌，这一时期的战争往往和荣誉、英雄以及爱国情怀联系在一起，个体的创伤表达是“缺位”的。现代战争文本主要包括“一战”后期以及“一战”以后的战争文学作品，传统战争叙事逐渐向“个体性的现代战争叙事”转变，创伤成了现代战争文学的重要母题。新世纪战争文本延续了现代战争文本的创伤书写，并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关注个体的精神体验。不同时期英国战争文学中幽灵的形象也相应有着不同的特点，幽灵在英语中我们可以用“ghost”来表达，从玄学意义上的幽灵到处于幽灵困境的边缘人物再到文本之间幽灵般的相互侵扰，英国战争文本中幽灵书写的层次不断深入，越来越能反映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诉求。

首先我谈一下传统战争文本中的幽灵，它主要被用作伦理说教的工具。在传统战争文本中，幽灵往往是某种集体意识、社会心理或社会思潮的体现，在文本中发挥着警示、告诫、引导等伦理教诲的功能，幽灵的形象具有十分强烈的符号特征与象征意义。在此前提下，人接受并理解幽灵的存在，两者能进行正常的互动，这种互动也影响读者对战争相关话题的看法，起到一种伦理规范的作用，而战争背后个体的体验也让位于幽灵所代表的某种伦理诉求，得不到真实的表达。例如，英国最早期的叙事长诗《贝奥武甫》的引子部分描写丹麦国王希尔德的海葬，“人们在他胸前缀满珠宝，让他们随主人/听凭大海的波浪，飘向远方”，就如同“当初他襁褓中/只身从惊涛中来到丹麦人中间/满满一船的礼品”。长诗的结尾同样描写了一场葬礼，只不过死去的英雄变成了贝奥武甫。“柴堆正中，英雄们放下/亲爱的主公”，将他和“项圈、金环/勇士们从龙穴/收缴的全部珍宝”烧掉，这两次葬礼首尾呼应，形成了一种叙事上的循环和重复：两位英雄都是用自己的英勇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并为人们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身披黄金和荣耀而来，最后也带着黄金和荣耀归去。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国王希尔德还是贝奥武甫，在本质上都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种人及社会心理所构建或想象出来的一个英雄，他们作为个体的存在性让渡于社会心理表达的诉求，自己是处于一种介于存在与不存在的幽灵状态之中，那么与之相互呼应，怪物身

上同样也有着这种幽灵的特质,《贝奥武甫》中最重要的是贝奥武甫跟怪物搏斗。综观整首长诗,英雄和怪物争斗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动力,怪物的不断死去和重新出现与英雄的死亡和重生形成了对照,怪物作为个体的身份也远远不及其符号和象征力意义重大,所以这个怪物和英雄打斗的过程象征人类征服自然,对未知自然的想象与渴望,也是氏族社会仇杀制度的真实体现。其实在这首长诗中有一段可以看到仇杀制度,比如说公主希尔白嫁到敌族,但是在婚礼上看到半丹麦人席乃夫突然举起利剑倒戈相向,给自己的国家带来无数的灾难,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举剑的人又是某种幽灵,这个部分看起来好像跟主题无关,但实际上有种道德说教的意味,就是对待敌人要毫不留情,盲目的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倘若英雄心存侥幸的话便会白白送命,所以贝奥武甫在以后的征途中不能心软。

从这个角度上看,在氏族社会的仇杀制度下,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民众也越发推崇和渴求英雄的诞生,战争也被塑造成为英雄证明自己、获取荣誉的一个手段,所以不管是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怪物,还是作为不死幽灵的英雄,都是氏族社会中社会心理和集体意识下的一个产物,所以战争对这种个体的意义被这种共同体叙事取代。不管是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怪物,还是作为不死幽灵的英雄,都是氏族社会中社会心理和集体意识下的产物,战争对于个体的意义也被这种共同体叙事话语取代。所以在之后的骑士文学中,各种幽灵形象的塑造多延续了这种传统,其往往是符号化的,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并在骑士文学固定的叙事框架中逐渐成为衬托英雄主义的工具。这种情况一直到莎士比亚戏剧中才有一点改变,幽灵的形象和象征意义在莎剧中变得越来越丰富,比如说我们从莎剧《仲夏夜之梦》的仙王仙后到《哈姆雷特》老国王的冤魂,再到《麦克白》中的女巫和班柯的鬼魂,这些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幽灵形象就更加多样,幽灵和鬼魂本身也有一定的自主性,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我们知道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三世》中,理查三世篡夺王位,杀妻弑兄,消灭异己,造成了无数的冤魂。在作品结尾,理查三世人心尽失,里士满伯爵发起了反对国王的战争,所有被理查三世杀害的人都化作幽灵来诅咒他“绝望而死”,最后理查三世也如幽灵所言,死于战争之中。这些幽灵在本质上都是王权争夺过程中的牺牲者。

与之前《贝奥武甫》和骑士文学中象征邪恶、恐惧的幽灵、鬼魂和怪物不同,这些幽灵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反而是正义的体现,剧作家本人将其“召唤”出来,并赋予其审判生者罪孽的权力,这些幽灵的控诉也从侧面传达了剧作家本人对理想君主的

标准，倘若君主符合人民的期待，便会受到人民的爱戴。反之，国家便会陷入战争与动乱之中，战争和幽灵成了衡量国王的准绳。从之前血腥、恐怖的怪物鬼魂，再到《理查三世》中象征正义的冤魂，幽灵好恶的变化也进一步佐证了幽灵在传统战争文本中是一种构建的产物，不同的形象实则反映了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而与之之前幽灵形象不同的是，莎士比亚所创造的幽灵并非单纯只是社会心理的反映，更是通过其自身超越生死的特殊性来影响战争和君主的评判，呈现出更强的伦理说教意味。

到了“一战”时期，幽灵就成为鼓吹爱国主义的一个窗口。“一战”刚爆发的时候，为了鼓励青年人参战，政府和媒体经常将战争和荣誉绑定在一起，许多作家诗人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在《弗兰德斯战场》这首诗歌中，诗人借助已经死去的战士的口，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用幽灵来呼吁士兵为战争继续战斗，“此刻，我们已然罹难。倏忽之前，……继续战斗吧 / 请你从我们低垂的手中接过火炬， / 让它的光辉，照亮血色的疆场 / 若你背弃了与逝者的盟约 / 我们将永不瞑目。纵使罂粟花依旧绽放在弗兰德斯战场……”这首诗歌主要通过 5 名罹难的士兵来动员其他人参战，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幽灵。值得注意的是，幽灵发声的背后恰恰是个体的沉默，那些死去的士兵在战场所经历的恐怖其实并没有得到真实的表达，幽灵所代表的更多是诗人本人的想象和官方政治话语的影响，这些亡魂既不像《贝奥武甫》中的怪物那样是恐惧的代名词，也不像莎剧中的冤魂一样是世间不公的批判者，他们实际是荣誉的体现：为国捐躯是勇敢爱国的行为，懦弱、恐惧和逃避则沦为一种“背弃”。在这些诗歌中，幽灵也在相似的表达模式中逐渐成为一种标签化、符号化的战友形象，发挥着政治宣传和军事动员的功能。

从《贝奥武甫》中的怪兽与怪物，到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各种超自然现象，再到“一战”爱国主义诗歌中死去的士兵鬼魂，幽灵始终是某种社会心理、集体意识或社会规范的反映。这一时期幽灵与战争叙事的结合忽视了对真实个体生命体验的关注，其本质是某种集体叙事而非个体叙事，幽灵也因此逐渐变成了伦理说教的工具，幽灵或恐怖、或可怜、或可敬的不同形象实则出自不同社会心理和不同创作目的的影响。传统战争文本的幽灵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被普通人承认、理解和感知的存在，人与幽灵的互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幽灵是特定需求下文本构建和想象的产物，这也是传统战争文本中的幽灵最重要的特点。

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沉默才被打破，关于战争的恐惧以及阵亡

者的讨论开始涌现，反战逐渐成为战争文学的主流思想，而战争文学中幽灵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幽灵不再仅仅是某种社会心理的反映，而是个体创伤体验的外化。在现代战争文本中，幽灵被塑造成创伤的症状，往往与梦魇、幻觉、臆想联系在一起，幽灵变成了不可理解和被忌讳之物。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中的主人公之一赛普蒂默斯在战争中见证了好友的死亡，残酷的阵地战使他患上了弹震症，死去好友的幽灵和战争的记忆不断地折磨着他，“他看见墙上有嘲笑他的鬼脸，那张脸在用各种恶毒齷齪的语言咒骂他，纱窗有无数只手在对他指指戳戳”，最后他不得不用自杀来寻求解脱。赛普蒂默斯会看见墙上有嘲笑他的鬼脸等，这种幽灵其实是他的内心创伤的体现。

帕特·巴克对幽灵的书写则更进一步，一方面，她在叙事视角上更关注个体而非旁观者的声音，从而赋予了幽灵具体的恐怖形象，反映了个体真实的精神体验。例如在《门中眼》中，主人公宛斯别克不断看到战俘的幽灵，闻到尸体腐烂的气味，甚至认为气味是从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鬼途》中的军官哈林顿同样噩梦缠身，总是梦见“黑暗中被炸掉的头、躯干和被肢解的身体被投到他身上”，幽灵的脸“俯视着他，脸上的嘴唇、鼻子和眼皮都被侵蚀了，好像麻风病一样”。这些幽灵与鬼魂的形象在作者细致的描写下显得更加恐怖与真实，有极强的感染力，同时幽灵形象的具化也体现了对个体精神体验的关注，幽灵不再是符号化的表达，而是不同个体真实经历的生命体验。

另一方面，这种个体的真实与外界的规范产生了冲突。在《重生》中，克莱格洛克哈特医院就成了规训遭受“弹震症”折磨的士兵的场所，那些精神崩溃的士兵被当成一群“懦夫、开小差的人、玩忽职守者和精神变态者”，以耶兰为代表的医生甚至对失语的士兵施以咽喉的电疗，整个治疗过程在旁观者看来更像是一种物理和精神层面上的对抗，这种对抗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个体叙事和集体叙事之间话语权力的冲突，是个体生命体验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下二元对立思想的矛盾。从这一角度来说，传统战争文本与现代战争文本中的幽灵书写是完全相反的，前者的幽灵代表着集体叙事，湮没了个体的声音，后者则将幽灵作为个体精神世界展现的窗口，并以此来对抗集体叙事。

而当个体所遭受的真实得不到承认，幽灵的存在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时，被幽灵折磨的人本身也会陷入不被理解的困境，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群，从而被幽灵化。这

一点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战”后以士兵回归社会为主题的小说中得到了不同形式的呈现：战后无法回归社会的士兵和没有经历战争的民众两者之间有着难以消解的隔阂，退伍士兵变成了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边缘人，他们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们的存在与其幽灵的体验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而恰恰是因为这种自我存在与他人认知之间的差异，导致他们如幽灵一般，陷入了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矛盾状态之中。对个体的幽灵体验的书写使得人们逐渐正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和精神危机问题。从个体的幽灵体验到战后边缘人群的幽灵化，战争的个体创伤在得到重视的同时，也反过来逐渐影响和塑造了民族的记忆，在战后形成了一种植根于社会心理的暗恐。这种暗恐就如同幽灵一般侵扰着战后人们的生活，即使战争过去了，对战争的恐惧却代代相传。

麦克尤恩的小说《黑犬》所关注的就是战后英国社会中的这种暗恐心理。小说中的琼原本是忠实的政党成员，但在乡间小道与两条黑犬遭遇的创伤体验让她转而投向神秘主义的怀抱。联系小说所指涉的各种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英国内部的党争事件，不难发现黑犬的出现实际上与琼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有着密切的关系，黑犬实际上也是琼暗恐心理的外化。与黑犬的遭遇也并不只是琼的创伤体验，更是民族战争创伤与文化忧郁的体现。这种对历史重现的暗恐是《黑犬》这本小说想要展示的幽灵。

在现代战争文本中，幽灵的形象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它不再是共同体叙事框架下社会心理的体现和伦理说教的工具，更不是某种符号的代表，而是一种建立在个体真实上的精神体验，这种个体性使幽灵有一种不被其他人理解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往往与恐惧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现代战争文本中的幽灵往往是恐怖的、可怕的，是被回避和忌讳的对象，人们往往不愿提及它或正视它，这使得遭遇幽灵的人也往往被社会边缘化，陷入了幽灵般的困境。这种困境与创伤的延时性（belatedness）和不可言说性（unspeakability）相互呼应：遭遇幽灵的人往往不被人理解，经历创伤的人也常常无法言说自己的创伤，幽灵也成了创伤症状的具体体现。在新世纪英国战争文本中，幽灵的形象与幽灵书写的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幽灵不再仅仅是某种恐惧心理的化身，遭遇幽灵的人通过直面幽灵甚至悦纳幽灵的方式，重温历史，治愈创伤。时间的距离使新世纪英国战争文学对两次世界大战的书写多了一种探究历史的维度，创伤的代际传递和战争记忆与历史的回溯成了新世纪英国战争文本的重要主题。在这种情况下，幽灵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与复生的死者，承担起了传递历史记忆的功能。

能，文本中人物对幽灵的态度实则对应着人物对战争、历史和现实的看法与态度。

第四部分是有关“新世纪战争文本中的幽灵”，在这个时期的战争文本中，幽灵主要反映了历史的再现和创伤的治愈。跟伦理说教和创伤症状不同，在新世纪战争文本中，幽灵不再是某种恐惧心理的化身，遭遇幽灵的人通常直面幽灵甚至悦纳幽灵，重温历史治愈创伤。比如在海伦·邓莫尔的《大衣》中，作者通过对士兵亚力克的鬼魂与活着的两个女性伊莎贝尔·凯莉和阿特金森夫人之间的婚外情描写反映了战后英国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在战争时期，女性顶替奔赴前线的男人成了重要的劳动力，战后却又被迫重新回到家庭，将“工作的机会留给男人”，这种境遇的变化让许多女性萌发了反抗的意识，并催生了新的女性主义思潮。《大衣》中的伊莎贝尔就是这些女性的代表。伊莎贝尔的丈夫是一名忙碌的医生，她却只能当家庭主妇，被“无聊与苦闷”困扰的她最终和年轻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亚力克的鬼魂开始了一段婚外情，并且有了孩子。通过已经死去的士兵的鬼魂幽灵跟两个女性谈恋爱来反映战后英国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焦虑，这种叙事是非自然叙事。亚力克生前曾是房东太太阿特金森夫人的情人，当时他驾驶的战机就坠毁在伊莎贝尔所租住的房顶上，亚力克本人和房东的丈夫、孩子都死于这场事故，现在的亚力克实际上是房东不断招灵所唤来的鬼魂，不断地重复着生前一段时间所做的事。在小说的最后，伊莎贝尔意识到亚力克困在时间循环中，她担心历史会重演，害怕战机可能会再次坠毁在这栋房子并杀死她的丈夫和孩子，因此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之前跟亚力克恋爱的甜蜜与激情也荡然无存。在某种意义上，房东太太和伊莎贝尔对亚力克的迷恋寄托着战时女性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抗，这种反抗与凯特·肖邦《觉醒》中艾德娜自我意识的觉醒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在《大衣》中，作者把女性的反抗意识与对战争的恐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房东太太和伊莎贝尔渴望重新体验战时女性所享有的独立和自由；另一方面，战争的残酷和血腥又抑制了她们的这种渴望与诉求，亚力克的幽灵身份以及他与房东太太和伊莎贝尔的恋情，更是从战后英国女性的角度反映了战争记忆、历史传承和战争创伤代际传递的问题，过去的历史仍在不断侵扰着当下，历史随时有重演的危机与风险。

与此同时，幽灵作为战争历史的承载者，也有可能成为治愈战争创伤的媒介，接下来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例如在《唯愿你在此》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杰克的创伤就是通过和幽灵的互动治愈的。杰克祖上曾有一对兄弟在索姆河战役中牺牲并被授予勋

章，这枚勋章成了家族荣誉的象征。而杰克的弟弟汤姆受其影响把战争看作获取荣誉和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因此他离家参军，“到军队中去寻求未来”。父亲因汤姆的不告而别饮弹自杀，杰克也卖掉土地，背井离乡。多年后，在伊拉克牺牲的弟弟的灵柩被军方送回，由杰克护送返回乡下埋葬。对杰克一家来说，家族战争英雄的故事以及战争即荣誉的观念如同历史的幽灵一般，侵扰着杰克一家的生活，并最终导致了家族的悲剧。原本选择逃避的杰克在知道弟弟的死之后，不得不直接面对这种战争历史传统所带来的创伤。

在护送途中，杰克不断回忆、反思家族的故事与历史，弟弟的幽灵也“逼真地在他面前出现过好几次”，有时是酒馆的侍卫，有时是饭店的厨师，有时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注视着杰克，静静地陪伴着他。在最后的路途中，杰克最终决定直面他曾逃避的一切，之后他再也没有看见汤姆的幽灵。对此杰克的解释是“汤姆现在完全相信他”，相信他能够自己面对这一切，因此汤姆的幽灵就不再出现了。对杰克来说，护送弟弟灵柩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驱鬼”的过程，不管是杰克提出“不要那面国旗”，将其从弟弟棺材上扯掉的举动，还是杰克将家族传承的荣誉勋章扔进大海的行为，都说明杰克已不再被传统的战争观念束缚，并试图走出其所带来的束缚和创伤。在这一过程中，弟弟幽灵的陪伴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幽灵的存在为死者与生者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幽灵也成了杰克回顾创伤与疗愈创伤的媒介。

英国战争文学中幽灵形象的演变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战争观，从玄学意义上的幽灵到处于幽灵困境的边缘人物，然后到历史的幽灵，幽灵的形象也随着不同时期战争文本创作目的的不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幽灵书写的层次不断深入，也越来越能反映人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诉求。分析英国战争文学的幽灵书写离不开历史的维度，既要关注单个文本幽灵书写的特殊性，也要从历史与叙事的角度考察其在特定阶段的意义和内涵。